

齐白石与八砚楼



图1 齐白石《寄萍堂》

■吉林长春 马洪

要说“八砚楼”，需要先了解一下“寄萍堂”。寄萍堂，乃是齐白石的居舍之名。1906年，齐白石从钦州游艺回家后，以几年作画、课徒、刻印所得润金一千块银元，在余霞峰山下茶恩寺镇荷月村茹家冲，购得一所老屋和二十亩水田，由其亲绘图纸，将破旧不堪的老屋修葺一新，全家老小从典租到期的梅公祠借山吟馆搬入此处新居。房屋依山傍田，有枫有松，清幽绝俗。齐白石将居所取名为“寄萍堂”，自号“老萍”“萍翁”“寄萍堂主人”，寓“人生如萍，于斯为寄”之意。

或问：寄萍堂为何模样？有图可

观。齐白石于戊辰（1928）年暮春之初，曾为友人吉翁先生画过一幅《寄萍堂》（图1）立轴，画面上绘两棵弯曲劲健的参天古柏，树后掩映一排黛瓦粉墙屋舍，屋后一抹浅褐山影，以衬托前景。树前为宽敞平坦的院落，有半截栅栏围拢，院中有一持杖长髯老者（画自己）散步其间，悠然自得。据白石老人之孙齐由来回忆，寄萍堂是一座很大的院落，有大大小小七十余间房和四五个天井，白石此画应是简化的寄萍堂。另据湖南湘潭籍学者黎锦熙《齐白石年谱》注云：“白石所造之寄萍堂，室内陈设雅洁，作画刻印之几案，式样古简，皆出自心裁。”由此可知，寄萍堂内外环境俱佳。

关于“八砚楼”，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云：“寄萍堂内造一书室，取名为八砚楼，名虽为楼，并非楼房，我远游时得来的八块砚石，置于室中，所以题了此名。”1906、1907年，齐白石应湖南同乡好友、时任兵备道道台的郭葆生之邀，赴钦州游艺，鬻卖书画印章，并在郭府教其姪人学画，兼给郭葆生捉刀代笔。先后游览了钦州城外的天涯亭、肇庆的鼎湖山、飞泉潭、高要的端溪、包公祠等名胜。这八块砚石，即是白石游历肇庆所得。以珍藏宝物冠名书斋，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流行的一种兴趣爱好，也是一种书斋文化，不同的斋馆名号，反映出各异的人生处事态度和价值取向。宋代文学家苏舜钦云：“窗明几净，笔墨精良，亦自是人生一乐”。文人喜以砚名书斋，如：清代学者何焯有“赅研斋”，大儒纪昀有“九十九砚斋”，藏书家袁廷枬有“五研楼”，画家蒲华有“九琴十砚楼”等。缘于“八砚楼”，齐白石又衍生出“八砚楼主”“八砚楼头老子”之别号，且刻有“八砚楼”（图2）斋号闲章。

寄萍堂书斋，其实初谓“九砚楼”，而非“八砚楼”，此乃鲜为人知。齐白石有一帧小画《石砚图》（图3）款识曰：“余曾为天涯亭过客，得端溪老洞石砚九，因以九砚名楼，后失其一，更楼名为八砚。八砚楼主者并记。”从画看，这是一方抄手砚，形制端厚古朴，为遗砚造像留念，可见白石失宠之憾。2014年北京荣宝斋秋拍“静悟堂”藏画专场，介绍一件署名“九砚楼主齐璜”的水墨镜心《传家宝》画作，谓：“‘九砚楼主’之款在白石作品中颇为罕见。1906年，白石回家乡建‘寄萍堂’，并于堂内造一书室，将远游时所得的八块砚石置于室中，取名‘八砚楼’，自称‘八砚楼主’‘八砚楼头老子’。后又得一砚，遂改称‘九砚楼’”。此说，与白石老人自述“因以九砚名楼，后失其一，更楼名为八砚”不相符合，应是不明真相的臆测和误解。

齐白石1920年所画《柑树图》，题款曰：“前朝丁未春，于沁园师处乞来柑树，栽于九砚楼前。”丁未春，即1907年春，可知此时寄萍堂书斋还称“九砚



图2 齐白石刻“八砚楼”印

楼”。如此看来，“八砚楼”的存在时间也并不长，据有学者研究，1909年10月，齐白石又将寄萍堂斋号恢复原来梅公祠所用的“借山吟馆”，并删掉其中的“吟”字，改称“借山馆”。而后，齐白石定居北京的几处居所一直沿用“寄萍堂”，书斋先后又称“甌屋”和“梅乌堂”，而未再使用“八砚楼”斋名。但是，白石老人直至晚年，其有些作画还署“八砚楼主者”“八砚楼头老子”“八砚楼头久别人”之别号，念及旧情。

寄萍堂书斋，九砚楼、八砚楼或借山馆，是齐白石中年时期的艺术家园和精神殿堂，青灯黄卷，翰墨丹青，他于此度过了十年安稳的时光。1917年，家乡兵匪作乱，生活多受袭扰，为避灾祸，且受好友樊山相劝，齐白石不得已才离开了茹家冲的寄萍堂以及这方清幽之地，赴京游艺谋生。从此，他心中郁结了绵绵四十年的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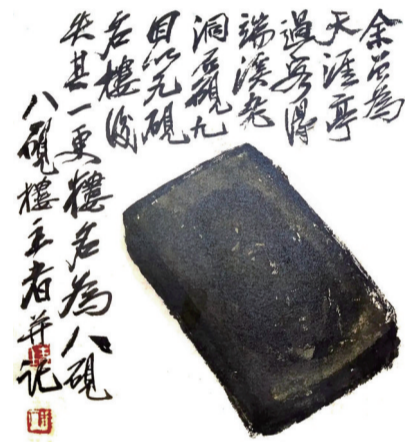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齐白石《石砚图》

细说慈禧御览《凤凰花竹图》

■江苏南京 王重阳 左中仪

台湾著名文物鉴赏家王震球收藏有一幅佚名《凤凰花竹图》（见图），此画作为设色纸本，长104、宽52厘米，约成画于清光绪中后期。

《凤凰花竹图》为工笔花卉与山水夹加纸绣合成之作，画中两只色彩斑斓的红腹锦鸡翘首伫立在山间岩石之上，与其上方一簇红牡丹花相映生辉，暗喻“锦上添花”美好意愿；周边有数根翠竹迎风摇曳，不仅在视觉上增加动感，也寓意“节节高升”和“青春永驻”。此画作以细致入微的锦鸡花竹与意境深远的云海岩石形成强烈反差，构成一幅具有民族色彩与审美意趣相结合的图画。

画的正上方盖有正方形朱文篆体“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”玺印；左上方盖有椭圆形朱文篆体“宣统御览之宝”玺印。

此画中，两只“凤凰”是用彩色丝绒在薄如蝉翼的宣纸上织绣而成，宛如纸面上的“浮雕”艺术，给人一种呼之欲出的感受。

纸绣又称“宣纸绣”，是一种以宣纸为载体，在苏绣基础上创造发明的刺绣方式，起源于明代。传统的制作工艺是：先在宣纸上绘制图画，再在宣纸背面涂上一层浆糊，然后在下面贴附一层纱布待干，再用细如发丝的绣针穿引上青檀丝、蚕丝、桑麻等彩色丝线精心织绣而成。旧时，此项独门绝技多为家族秘传，曾经一度濒临失传。近年来，

有江西南昌顾姓艺人根据其祖传技艺恢复和发展了宣纸绣，人称“中华一绝”的纸绣技艺由此得以“重生”。

“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”乃是西太后的字画鉴藏御玺。慈禧经历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，垂帘揽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。这位权倾朝野的老佛爷虽是粗通笔墨，但也时常会搞点附庸风雅、怡情翰墨之事。据当年常出入后宫的美国传教士何兰德撰述介绍：光绪年间，内宫备有十八位画师专为叶赫那拉氏作画，此类画作初不题款识，或是被盖上“慈禧皇太后之宝”或“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”玺印，变身成为“慈禧御笔”，用于日后赠予群臣以示恩宠；或是被盖上“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”玺印，留存于宫廷收藏。在内宫众画师中，最为知名者当属缪嘉蕙与屈兆麟两位大师。

缪嘉蕙（1841—1918），字素筠，云南昆明人，清末女画家。其善工翎毛、花卉、虫鱼，亦精书法，有“女红艺杰”之称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应诏入宫，为慈禧太后首席御用画师，年俸白银两千八百两，后又赏封三品顶戴，追加俸银一万两。

屈兆麟（1866—1937），字仁甫，北京人。18岁入宫，官至内务府造办处如意馆“司匠长”。他的“细笔花鸟，悉能生动自然；山水、人物，皆靡不精妙，尤善松鹤、灵芝等”，是一位全才宫廷画家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，跟随溥仪出宫，结束了自己长达四十年的宫廷画师生涯，从此漂泊江湖，以卖画为生。

“宣统御览之宝”本是清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字画鉴藏御玺。不承想，此枚玺印日后却成为“紫禁城字画盗运案”的铁证。

1908年11月14日，光绪帝驾崩，慈禧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的长子溥仪继承大统，年号“宣统”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1912年2月12日，清廷颁布《清帝退位诏书》，清朝灭亡，逊帝溥仪仍旧居住在紫禁城并保有一定的待遇及尊号。直到1924年11月5日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将溥仪等人驱逐出宫，后者辗转至天津寓居。

关于此枚鉴藏御玺，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如是描述道：“我在婚前不久（即1922年12月1日前），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事。那时根据庄士敦（洋帝师）的建议，我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的机构，专门进行这项工作……特别是罗振玉（南书房上行走），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盖上一个‘宣统御览之宝’（玺印），登记上账……当时我却不知道，不点还好，东西越点越少，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。”

在紫禁城“小朝廷”时期的12年内，溥仪以各种名义赠予他人、变卖与抵押及宫监盗卖等，造成无以计数的历代宫廷珍藏书画的流失，而溥仪自己就是偷运各类珍宝的“祸首”。据1934年出版《故宫已佚书画目录》中的不完全统计，仅在1922年的7月12日—12月12日五个多月内，溥仪借其弟溥杰每天进宫伴读之际，以赏赐为名，私自夹带



偷运出宫的各类书画就达1300多幅。可以说，“宣统御览之宝”玺印见证了这场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空前浩劫。

《凤凰花竹图》以吉庆祥和的氛围而引人入胜，虽说是迎合了慈禧的虚荣心，但对于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而言，也不过就是镜花水月罢了。